

事件观

有多少垄断以政府指定为名

杨海

好产品的标准有很多种，但政府指定绝不是其中一个。

不久前，广东省高院判决省教育厅在一次技能比赛中，指定某软件为独家参赛软件的行为属于滥用行政权力，违反了《反垄断法》规定。这是国内首例针对行政垄断的司法判例，也是2008年《反垄断法》颁布以来，少有的政府涉嫌违法的诉讼。

垄断是竞争的对立面，法院认定省教育厅独家指定的行为，产生了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换句话说，在这场软件商的竞争中，广东省教育厅使用行政权力参与了垄断。

这次独家指定无疑会直接影响软件商的市场份额，并且可能改变参赛者的使用习惯，变相提高被指定公司的市场声誉，对其他公司造成损失。

一件商品被消费者选择，依靠的是价格、质量和服务等要素。企业只有在竞争压力下，才会努力优化这些要素。从消费者角度来看，竞争带来商品品质的提高；从社会角度来看，竞争优化配置了资源。

政府的目的是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这与公平竞争带来的最终结果也不谋而合。

所以，竞争是一道必经的程序，即便是一件最优质、最合适的产品，也应接受公开竞争的检验，而不是通过政府指定，强制占领市场。

在这起案件中，广东省教育厅选择了教育部在全国比赛中使用的同款软件。但广东省高院认为，教育部并没有规定各省需要与国赛使用的软件保持一致，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省教育厅应经过公开、公平的竞争性选择程序，来决定使用相关商家的软件。

选择程序不合规、不透明，就会给权力寻租留下空间。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政府统筹配置资源的旧思路还没有完全消除。

孩子与总统

8月6日，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一个贫民窟，总统选举的一处投票站入口贴满了竞选海报，一个孩子在玩耍。视觉中国供图

府和市场的关系也没有完全厘清，公共权力强行干预市场竞争的情况时有发生。或许是比赛用的软件，或许是马路两侧的路灯，也可能是某项重点工程，都有被指定的可能。

政府干预市场的前提是市场失灵，而不是在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下随意介入；政府应在市场中发挥指导、服务、监督的作用，给所有市场主体参与公平竞争的机会，而不是代替市场，干预市场主体的正常经济活动。

因为我国地方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仍被地方政府主导，为了保护当地企业，地方政府往往通过自身的行政权力实施地方保护主义，设置行业壁垒防止外来企业进入本地市场。行政权力干预地方经济的后果之一就是造成市场分割，限制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影响市场机制高效运行，最终拖



慢全国经济发展。

也正因为此，2016年6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截止到2016年年底，已有15个省市部门被国家发改委公告处理。这些违法案件中，小到对学生装投标人资格设置歧视性条件，大到12个省市指定供电企业，都涉嫌滥用行政权力。

尊重市场，竞争优先 最大限度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 等原则，都被写进了《意见》里。据此，行政机关指定的市场准入、招商引资、政府采购等规章、文件等，都将受到审查。

从源头上阻断行政垄断需要制度保障，但政府如何管好干预市场的手，更根本的是需要市场的尊重，对权力边界的敬畏，以及对公平竞争的信仰。

新闻眼

袁贻辰

大妈的胜利？

自从加入那个由中老年妇女组成的讨债团，双目失明的高云(化名)就仿佛重获光明。

她再也不是那个得了糖尿病和冠心病却只能吃低保的废人了。30多个老姐妹一道，拿起扩音喇叭，像一群女战士，站上又一个又一个建筑工地和小区楼盘的地界，替老板讨债。

大妈们拉开架势，嘴里像机关枪一样蹦出你个鳖孙，舜种，撕扯推搡不断。她们忘了自己是乳腺癌或高血压患者，一定要吵到对方答应还钱。几个小时不行，那就一天，一天解决不了，那就天天来。

这活儿比跳广场舞、听电视有意义多了。不仅自己有了用处，碰到大方的老板，高云一次还能拿好几百元。再不济，也会管饭。

从2013年开始，这个当地人口中的大妈，骂骂咧咧地在河南省商丘市所向披靡，炒出名气的她们共参与了29次讨债滋事行为。高云也慢慢发现了自己的价值，正常讨债太难了，男人去讨债很容易打架，她们都是老弱病残，对方拿她们没有办法。

越来越多不认识的入托亲友、邻居辗转找到她们帮忙，高云一次又一次冲上战场，有时在医院帮人处理医患纠纷，有时是拆迁出了问题，还有时候邻居间发生矛盾，也来拜托这群老阿姨帮忙。她们像太平洋警察一样，忙到四处赶场，处理这座城市层出不穷的争端。

高云一度以为自己在一生的下半场胜利了，直到法院的判决书飘然而至，这个大妈团的14名主要成员被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寻衅滋事罪，判处2年至1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高云被判了5年。

大妈们输得一塌糊涂。可这场战斗的输家似乎却不止大妈。有大妈的亲人透露，商丘这样的讨债群体还有很多，有艾滋病患者队、残疾人队、老人队。一座城市竟然需要如此多的弱势群体来维持公道，也许很多东西在这儿都已输了个干净。

粉丝的胜利？

演员杨洋的粉丝用行动践行了两句颇深入人心的广告语，一句是“爱他，就要给他最好的”，另一句则是“爱要大声说出来。两句活摘一块儿，让人不免胸口闷得慌，那是被沉甸甸的爱压的。

厚重的爱淹没了影院的预售系统。数以万计的粉丝为了杨洋挑大梁的某部大银幕作品，一举攻入电影网络售票平台预售系统，提前买票，锁场。粉丝中传颂着“锁场”的奥秘，在影院放出排片后，第一时间购买空场次的电影票，把场次锁住。这样影院就不能撤场次或换场，以保证影片排片。

粉丝在各个平台宣扬着这份爱，他们从不同城市出动，席卷热门影院黄金时间的场次，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年轻的粉丝感冒，眼睛都瞎了，还有大量粉丝冒着高温酷暑，放下手中工作和影院斗智斗勇，粉丝平台充斥着激动人心的口号：锁场需要每一位羊毛(杨洋粉丝的昵称)的行动，请大家跟着妈妈撸起袖子好好干。

看起来，是劳神又费力的粉丝为他们的偶像赢得了这场胜利。但胜利背后，观众用差评和口水回应了粉丝这份沉重的爱。

被锁住的也许只有投资方和杨幂本人。他们又一次翻脸，主演片子多烂，下一部再下一部杨幂主演的电影只要有粉丝，只要还有这样铁索连环般的锁场，就一定不会亏本。

令人窒息般的锁场，不会将玉石打磨成器，只会将其终日锁在温室里，少了风吹雨淋，少了刀斧加身，最终裹上厚厚的、蜜一般的石皮。

潜规则的胜利？

来自山西的老师那艳军深谙潜规则一词，逢年过节，没点表示，怎么能算得上懂事呢？

前些日子，这位山西省政协办公厅的副主任科员迎来了自己的生日。在一个名叫那艳军公务员考试网学生群的微信群里，他开始向500个有意考公务员的后备军讲述规则，没有祝福语的群员们抓紧退群，你不是我的队伍成员，更不是我的学生。

没表达心意的以后不要开口了。说完，贴上了一张微信红包8.88元的转账记录。

按那老师的说法，这个群在过去是用来讲解公务员考试经验、分享考试信息，也许这次也不过是一堂特殊的授课。

500个学生各自领受了老师的意见。有58个学生送来了祝福，金额共500.3元，大量的学生沉默，还有40多个学生退群。最后，懂事的男生打圆场说，这么重要的日子里，老师高兴最重要。

这堂那老师身体力行的、属于准公务员们的规则课这才圆满落幕。

没脑子的赶紧退群，别让我生气，大浪淘沙。那老师在课上发怒之余，不忘补上这句话。

从那40多个选择退群的学生来看，事后被省政协处分、称自己酒后失言的那艳军，其实也并未句句失言。至少这句大浪淘沙，他说对了。

三个家庭的分岔路口

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 玄增星

砖块已经垒到第40层。砖墙后面，一所学校的蓝色大门彻底从人们眼前消失了。这是北方某大城市一所容纳了500多名打工子弟的民办学校。

学校的关闭与暑假几乎同时到来。6月初的一个下午，当8岁的儿子紧攥着一张传单，哭着回到家的时候，李中山正在补觉。

床就挨着门，跟颜色泛黄的沙发拼在一起。李中山是农贸市场一家猪肉批发商的屠夫兼送货员，老家在安徽阜阳。每天凌晨两点到中午，他负责把新鲜猪肉送到几个饭店和食堂，下午是他补觉的时间。

看到传单，他立时清醒了。那是当地政府致未获批准民办学校学生家长的一封信，信上说，这所学校没有办学资质，存在消防安全、食品安全、教学设施简陋等诸多问题，要对其全面清理和坚决取缔。

为了您和学生的切身利益及人身安全，请不要将学生送到该校就读，否则造成一切损失，责任由您自行承担。

7月6日这天，当当地下了一场暴雨。学校里的1300多套桌椅，还有黑板，甚至床铺，都被货车拉走。三四辆车在泥泞窄小的土路上折返了60多趟。

一道砖墙随后砌了起来。墙内除了空荡荡的校舍、五彩斑斓的墙壁、高竖的旗杆，没剩下什么了。

在这个暑假，家长们必须操着不同的方言，为孩子找到新的学校；而他们的孩子，统统说着流利的普通话，没有一点儿其他口音。

等你长大就明白了

杨萍(化名)的儿子跟李中山的儿子是前后桌。他识字不多，消息还是读小学二年级的儿子念给她听的。家里给这个孩子起名“安穩”，希望他的人生稳当。

自今年3月从老家山东来到这座城市开始，杨萍和丈夫就在一个地铁站出口的停车场负责看车。角落里的管理处就是他们的家，面积不超过4平方米。一张双层床、一张桌子和一个柜子之外，只够放下一把椅子。家里没有冰箱，他们需要每天去一趟市场，购买当天吃的蔬菜和馒头。用水要到地铁站里接，上厕所就去附近的公厕。

杨萍几乎从没光顾过市场里陶玉春的摊位。因为那里是淡水鱼区，太贵了，买不起。陶家是从安徽到此地做水产买卖快满20年，小儿子正在读五年级，还有一年就可以毕业了。他每天凌晨1点钟起床，把门前鱼塘里从各地运来的草鱼、鲢鱼、鲤鱼用网捞起，送上鱼贩的车，再拉往不同市场。

在这个距离市中心近40公里的乡镇，外地打工者形成了一张网络，网上交织着血缘、商业和人情上千丝万缕的联系。连接村庄的土路上不断驶过自行车、三轮车、电动车和汽车，在干燥的夏天，车轮扬起的沙尘夹着热浪滚滚袭来。路边的人大多趿拉着拖鞋，男人多数光着膀子，身上晒得黝黑。

如今，因为一所学校的命运，这张网开始震荡。

校长胡中宝处于这张网络靠近中心的位置。他那辆破旧的面包车后座上还堆放着一些学生来不及取走的被褥。胡中宝老家在河南，早年也在外地打工，19年前开始开办打工子弟学校。他的学校没有办学资质，好几次说要被关。这一次，他原本觉得有99%的希望不会关门。

他的希望逐渐减弱，一直到7月6日早上，货车轰隆隆开到了学校门口。

7月6日当天，李中山特意带着儿子去了学校。为什么要拆我们学校？儿子带着哭腔问。他不知道如何回答，叹了口气：等你长大就明白了。

大雨中，从门外看，只能看到高高的旗杆。孩子眼睛一亮，手拍得老高，爸爸你看，红旗还在呢，学校没拆！

两年前，李中山想过把达到入学年龄的孩子送进公立学校。他居住的地方，距离镇上的公立小学不到1公里，走路只要10分钟，可他在大门口就被拦下了。

看门的直接告诉我学校名额满了，不让我进。这个屠夫身材壮实，手上永远缠绕着一股肉腥味。

同一个市场另一头的水产区，个子矮小的陶玉春根本没走近过那个校门。人家不认识你，进去找谁说话？

在狭小的停车场管理处，杨萍也说了同样的话。他们相信这个社会重视关系和人情，不愿意徒劳碰壁。他们的许多重要信息来自听说，比如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想要进公立学校，需要备齐很多证件，尽管不知道具体是哪些，但他们坚信自己拿不出来。

陶玉春老家发过一次大水，地里的庄稼全淹了。后来他卖过水果、运过木材，最后还是坐上了前往这座大城市的绿皮火车。那是1998年，他清楚地记得一张车票要68元，列车上挤满了背着蛇皮袋子出来打工的人。他跟妻子把被子放在过道里，来个人就要让，坐一会儿站一会儿，熬过了一天一宿。

李中山比他早到6年，同样是挤在车厢里过生活。那5年里，在家里收妻子的前一天，一直憋着劲儿要走的李中山终于离开了家乡。大巴车上有40个座位，却塞了116个人，根本上不了。当时只有1.5米个头的李中山被人挤到了目的地，他带了200元钱，分开装在腰

带、裤兜和鞋底里。

那是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中出现了国家最早涉及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的安排：适龄儿童、少年到非户籍所在地接受义务教育的，经户籍所在地的县级教育主管部门或者乡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按照居住地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申请借读。

但小学都没毕业的李中山并不在意，因为他是来赚钱的。

刚开始，从没做过水产生意的陶玉春把高利贷借来的本钱赔了个精光，鱼也丢了，筐也丢了。这对南方夫妻没想过冬天这么冷，靠着四处借钱，才慢慢缓过来。

过了两年，他们把大儿子从老家接来。2001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将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视为政府必须依法保障的权利，明确提出了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的两为主政策。

他记得自己填了张表，就把孩子送进了附近的公立小学。大儿子学习成绩特别好，家里的生意也慢慢上了正轨。那几年，陶玉春甚至觉得自己已经融入了城市。

李中山也有过快乐的日子。20世纪90年代初，他在一家煤炭企业搬运蜂窝煤，每个月能挣260元，那时他每月的生活费大概只要30元。第一次发工资，他跑到地摊上给自己买了一身新衣服，蓝色的牛仔外套、黄色的毛裤和白色的回力球鞋，五六件衣服里有一半是二手货，但他还是高兴了一天。

那时，他最喜欢趴在墙头看马路上闪着灯光的车流，经常从晚上10点看到凌晨两三点。他还总是特意去坐大楼里的电梯，那些都是他在老家从没见过的光景。

如果不是一次工伤事故把他的两根手指轧断了一节，这种快乐还将持续好多年。他只待了两年，就离开了。

从繁华地段到城市边缘再到郊区

这些年里，陶玉春的落脚点一直在变。2003年，他所在的市场被拆了。听说另一较偏的地方有市场在招商，陶玉春把所有家当装上一辆货车，在非典期间搬了过去。

他记得，从那时起，公立学校开始变得难进了。大儿子正上小学四年级，但是公立学校名额满了。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教育发展改革报告(2016)》显示，2000年到2010年，全国0~17岁流动儿童规模10年间增长率超过10%。许多城市的公办学校却在不断合并、减少。

陶玉春把大儿子送进了民办学校。1998年，当时的国家教委在《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中提出，专门招收流动儿童的简易学校的设立条件可酌情放

宽。

在陶玉春搬家的同一年，胡中宝开办了他的打工子弟学校，第一学期只招了13个孩子，到了第二年，就到了100个。截至目前，这所学校已经累计接收过1.3万多名流动儿童，用胡中宝的话说，服务两代人了。

两年前，陶玉春把该接受义务教育的小儿子送到了胡中宝的学校。但他所在的第二个市场的土地，要被征用建造回迁房，他只好再一次把十几年的家当装进货车，从城市边缘搬到郊区。

市场摊位后面就是这一家人的住所。除了墙壁是彩钢，室内跟普通人家没有什么区别。在这里待了十几年，家里的东西越来越多，这一次他搬了六七趟。

相比之下，杨萍一家是到来最短的。去年3月，他们到达后，没时间欣赏这座城市的容貌，刚下火车，就钻进了地铁。此后的一年多，这家人大多数时间里，生活范围就是地铁站旁的停车场管理处。

刚来的时候，房间里只有一张单人床，三个人根本睡不下。他们捡了一张全部抽屉都坏掉的桌子，又在二手市场买了一张双层床。几把椅子也是捡来的，靠背已经断掉。

杨萍并不知道，在她来到这里之前，国家已经开始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非本地户籍适龄儿童进入公立学校的门槛进一步提高。打工子弟学校，是这个识字不多的女性，为儿子作出的选择。

从流动儿童到留守儿童

李中山记得，在老家每次考试过后，有小姑娘成绩不好，常有老人念叨：都坐轿子谁来抬？

十几岁时，李中山听了总是说：总有一天大家都不用抬。老人把眼一瞪：轿子还会飞？当时的他莫名地相信：有一天会飞。

几十年过去，40多岁的李中山如今有些动摇。

他算过，如果要让孩子上公立学校，他每年至少需要交1万元社保，几乎占他全年收入的四分之一。要是能交得起社保，还在这里打工？他打工受伤后曾离开过这座城市，在温州做过塑料加工，在港口拉过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他3天等不来一趟活，只能把货车卖了，赔了七八万元。

老百姓就是老百姓。他垂头丧气。听说有亲戚在这座城市做猪肉批发，6年前，他带着老婆孩子又回来了。

根据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流动人口呈现举家迁移特点，近九成已婚新生代流动人口是夫妻双双一起流动，与配偶、子女共同流动的约占60%。

从家里到学校，走路只要十几分钟。